

新
叢書39

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起

阿爾文·古爾德納—著
顧昕—譯

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起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阿爾文·古爾德納—著

Alvin W. Gouldner

顧昕—譯

桂冠新知叢書 39

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起

著者—阿爾文·古爾德納

譯者—顧昕

責任編輯—馬娟娟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地址—臺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368-1118 363-1407

電傳—(886 2) 368-1119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刷—1992年4月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488-2

定價—新臺幣1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購書專線/ (02)367-1107〉

鳴謝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華盛頓大學指導一個由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主辦的研究班，我在這個研究班上全面地討論了關於新階級的論題，這些論題經過某些修改後在本書提出來。我要向參加過這個討論班並給我提出過批評意見的學者表示謝忱，他們是：安德魯·阿拉圖(Andrew Arato)、羅德·坎普(Rod Camp)、理查德·科爾瓦德(Richard Colvard)、科內利斯·迪斯科(Cornelis Disco)、杰弗里·福克斯(Geoffrey Fox)、薩倫·古普塔(Suren Gupta)、約瑟夫·海利(Joseph Healey)、威爾·凱姆(Will Keim)、卡利爾·納克勒(Khalil Nakhleh)、約翰·紐梅爾(John Neumaier)、羅杰爾·紐科姆(Roger Newcomd)和愛德華·普賴斯(Edward Price)。我要特別感謝的是，一九七七年秋我在歐洲講學期間，薩格勒布大學、哥本哈根大學、維也納高等研究院、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爲我提供了與同行討論這些論題的機會。我尤其要感謝羅伯特·麥考利(Robert McAulay)、朱迪·格林(Judy Green)和珍妮特·沃克·古爾德納(Janet Walker Gouldner)所提供的幫助。本書中依然存在的錯誤和遺漏完全由我本人負責。

你們這些知識的熱愛者，
只要不能成為統治者和占有者，
就去作強盜和征服者。不久
歲月流失，你們會
像林中膽怯的鹿兒一樣知足地活着，
直到最終，知識的追求將達到它應該達到的地步：
它將去統治和占有，而你們跟隨着它。

——尼采《快樂的科學》

下層階級之中的不滿可能引起的病症，
我們有良藥醫治；
但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之中的不滿，
會導致難以診斷和治癒的慢性病。

——奧托·馮·俾斯麥《全集》第13卷第563頁

鳴謝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華盛頓大學指導一個由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主辦的研究班，我在這個研究班上全面地討論了關於新階級的論題，這些論題經過某些修改後在本書提出來。我要向參加過這個討論班並給我提出過批評意見的學者表示謝忱，他們是：安德魯·阿拉圖(Andrew Arato)、羅德·坎普(Rod Camp)、理查德·科爾瓦德(Richard Colvard)、科內利斯·廸斯科(Cornelis Disco)、杰弗里·福克斯(Geoffrey Fox)、薩倫·古普塔(Suren Gupta)、約瑟夫·海利(Joseph Healey)、威爾·凱姆(Will Keim)、卡利爾·納克勒(Khalil Nakhleh)、約翰·紐梅爾(John Neumaier)、羅杰爾·紐科姆(Roger Newcomd)和愛德華·普賴斯(Edward Price)。我要特別感謝的是，一九七七年秋我在歐洲講學期間，薩格勒布大學、哥本哈根大學、維也納高等研究院、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爲我提供了與同行討論這些論題的機會。我尤其要感謝羅伯特·麥考利(Robert McAulay)、朱迪·格林(Judy Green)和珍妮特·沃克·古爾德納(Janet Walker Gouldner)所提供的幫助。本書中依然存在的錯誤和遺漏完全由我本人負責。

你們這些知識的熱愛者，
只要不能成為統治者和占有者，
就去作強盜和征服者。不久
歲月流失，你們會
像林中膽怯的鹿兒一樣知足地活着，
直到最終，知識的追求將達到它應該達到的地步：
它將去統治和占有，而你們跟隨着它。

——尼采《快樂的科學》

下層階級之中的不滿可能引起的病症，
我們有良藥醫治；
但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之中的不滿，
會導致難以診斷和治癒的慢性病。

——奧托·馮·俾斯麥《全集》第13卷第563頁

譯者序

——重溫理想國的千年古夢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借蘇格拉底(Socrates)之口說：「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否則的話，……對國家甚至我想對全人類都將禍害無窮，永無寧日。」這就是那個千年難醒的聖哲國王之夢。兩千年後，知識真正成為推動社會繁榮進步的決定性力量，知識階層作為新興的社會力量，日益在社會結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於是，在這些角色的扮演者中，便不乏一批千年古夢的重溫者。其中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W. Gouldner)就是為知識分子「國王」鳴鑼開道的猛將。

對社會學略知一二的人，無人不知古爾德納的大名。這位派森思(T. Parsons)的學生，以一部矛頭直指派森思之結構功能主義的《西方社會學即將來臨的危機》而聲名鵲起。此書為他贏得了美國社會學學會頒發的最具權威的索羅金獎。之後，除了在社會學理論方面頗有建樹之外，他把精力主要用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知識分子問題。他自一九七六年開始出版他的著作——《辯證法的黑暗面》三部曲。其中第

二部《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對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階級的興起做了出色的分析，因而名噪一時。〈紐約時報〉評論道：「他以這本書吸引了讀者，就像馬丁·路德把其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登堡萬聖教堂的大門上。」《政治科學季刊》的評論說：「這是一部才氣橫溢的著作。古爾德納使受到大量抨擊的『新階級』的概念取得了顯赫的地位。」《泰勒斯》的評論說：「雖然這本書在古爾德納的三部曲中篇幅最短，……但在許多方面它是最關鍵的一部著作，……也許它是一種新的、左翼的、後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最重要的基石。」

今天，我們有幸得以在冷靜的氣氛之中思考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問題。為此，讓我們重溫一下古爾德納在十年前構畫的新理想國的夢境，或許是不無裨益的。

知識階層的崛起和 新階級*的理論

自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最明顯的社會現象莫過於知識的社會作用愈來愈顯著，及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的日益提高。自從科學家在十八世紀成為一種新的職業以來，它的從業人員一直在增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學家的數量呈指數增長，它源源不斷地生

*在英文中，「階級」和「階層」是一個詞。在中文中，「階級」特指根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作為標準而劃分的階層。由於在這裏的討論中，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不是主要的內容，因此對階級和階層不做嚴格的區分。

產着新的知識，推動着一次次技術革命，為社會的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因而它成為當今社會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社會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美社會，一個新生的中產階級悄然出現，它人數倍增，職能廣泛，「白領」已經充盈所有現代的機構。由於生產發展，技術工藝的日益複雜，勞動分工更加專業化，在資本主義社會心臟——企業——的內部，出現了在經濟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兩權分離，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退居幕後，一個主管企業經營和發展的經理階層登上了歷史舞台。隨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勾畫的基於「理性的法律而實施管理、統治的機構」，亦即官僚組織的增長，大批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進入這日益龐大的官僚組織，成為利益重疊的「權力精英」（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稱為「國家幹部」）。所有這些，自然依賴於一個嶄新的公共教育體系的發展，而這又促進了教師集團的迅速擴展。教師在當今社會中被認為是社會的「代表」。

這一切不能不引起身為知識分子之一員的社會理論家的注意。於是，關於知識分子新階級的理論層出不窮。

美國社會學泰斗派森思從他保守性的功能主義社會學理論出發，認為知識分子新階級是一個「職業人員」的集團。它負有某種道德責任，負責將唯利是圖的舊階級提高成一個具有集體意識的階級，最終它們熔為一體，塑造一代新的精英，克服舊階級的合法性危機，從而實現社會的整合。然而，這不是對現實分析，而是派森思在其理論大廈中精心設計的一個花園。

幾位年少氣盛的社會科學家，如諾姆·瓊斯基(Noa Chomsky)和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則憤憤然地

指責知識分子新階級是權力的奴僕。舊階級一如既往，仍然把持着社會的權力，而新階級則爲了得到讚賞、發迹、獎勵、出人頭地而諂媚。

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些學者（他們大多身兼政治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官僚階層的抨擊和憂慮。托洛斯基（Trotsky）三〇年代在流放中說：「生產資料雖屬國有，而國家却『屬於』官僚階層。」巴枯寧（Bakunin）警告說：「社會主義專家學者的統治是所有專制暴政中最壞的。」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錫克（兩位都擔任過各自政府的副總理，後來流亡國外）分別寫下了言辭激烈的《新階級》和《共產主義政權體系》，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階層。而列寧和鐵托在晚年都爲官僚階層的膨脹而憂心忡忡。

與此相反，美國兩位紅極一時的自由主義者，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Galbraith）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則爲新階級大唱贊歌。加爾布雷斯秉承一直被忽視的維布倫（又譯凡勃倫）的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傳統，解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分配結構，他在《新工業國》和《經濟學和公共目標》等一系列著作中，強調現代資本主義大公司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in 生產、經營管理、財務、推銷、法律、科學技術研究等方面有專業知識的專門人才的手中，他們擔任公司的經理、工程師、各級主管等職務，他們集體作出決策，他們的決策具有權威性。專家統治論者處於權力結構的中心。貝爾那本影響波及幾大洲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國大陸前些年關於新技術革命的空前熱烈的大討論之源就是這本書），乾脆預言未來的後工業社會是以理論知識爲「中

軸」的。他說，「很清楚，在未來的社會裏，不論人們如何下定義，科學家、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和技術官員將會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導作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版第 91 頁）。

而德國的社會批判理論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則不僅對有產階級毫無依戀之情，而且對新階級中的技術知識分子也深為反感。他建議恢復道德和理性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並使技術專家服從之，而這些道德和理性的監護人則是那些人文主義精英，即批判理論家。

凡此種種的確令人眼花撩亂。於是，時勢造就了古爾德納，他挑起了綜合新階級理論的重任。

人類歷史上的新王牌

古爾德納把他的新階級理論建立在兩大支柱上，即文化資本理論和語言共同體理論。

在古爾德納看來，新階級既不同於過去的無產階級，也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它是一種文化資產階級。新階級脫胎於舊的資產階級，它最初無非就是由舊階級成員的受過教育的姐妹、兄弟和子女組成。公共教育體系的出現和發展擴大了新階級的來源。從而，新階級開始強調它的自主性，強調它同舊階級相脫離，並且具有獨立的「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而這種自主性的基礎，是所謂的文化資本，即經由教育體系傳授的專門知識或技能。這樣，新階級就有一種被稱為「職業主義」的意識形態，它雖然把矛頭直指舊階級，但却心

照不宣地宣布新階級在專業技術和道德上優於舊階級；它提出的核心主張是新階級的合法性，從而也就取消了舊階級的權威。

文化資產階級這一成分的劃定，是基於所謂的一般資本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凡是能為生產有利可圖的商品做出貢獻並為其擁有者帶來獲得合法規定收入之權利的任何客體都是資本。因而，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資本只是「一般資本」的特例。正是在科學技術成果及現代科學管理知識與技能成為社會經濟運轉的主動力的今天，傳統資本（即金錢）的支配性地位開始讓位於文化資本。事實上，古爾德納的文化資本說是以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為背景的。早在一九六〇年，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就提出人力資本（教育、才能、精力、意志）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重要得多。舒爾茨因此看獲得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現在，人力資本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然而，文化資本並不一定為新階級所獨占，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哪個階級沒有文化呢？為了將新階級同其他階級加以區分，古爾德納又提出兩條標誌：(1)新階級占有相對大量的文化資本儲備，而且其收入來源主要是文化資本；(2)同時，新階級還擁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即評論性的論說文化。

古爾德納借用語言學家巴塞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有關知識分子表達交流符號的研究，提出新階級是一個語言共同體，其成員共享一種所謂的評論性的論說文化（簡寫 CCD）。這實際上是一種語言和思維模式，是在日常工作和學術辯論中發展出來的一套精緻嚴謹的交流密碼體系。它強調探討規則，強調不受外界環境的左右（即所謂的「情

境無涉性」)，強調對交談者之結論的評判不取決於交談者的身分（例如年齡、地位等），強調評判不通過掌握權力的權威來行使。最後這幾方面使我們聯想到美國社會學家、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關於科學精神的闡述。他認為科學精神之一是所謂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即對科學成就的評判不應同科學成就創始者的任何社會屬性（例如年齡、種族、國籍、性別、宗教信仰等）有聯繫。很顯然，古爾德納提出的評論性和論說文化，就是科學精神（普遍主義）在整個知識界的外展。

正是由於作為文化資產階級和作為擁有評論性的論說文化的語言共同體，決定着知識分子新階級的種種特徵。作為文化資產階級，新階級同舊的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它要求掃除阻礙其優勢發展的不平等，打破原有的等級體系，使財產日趨公有，以便突出其文化資本的決定性，從而為新階級謀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新階級 CCD 是一種解放力量，但它本身包含着自我封閉的種子。它強調謹慎、自律和嚴肅，因而容易喪失熱情和自發性；它強調情境無涉性，這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對環境背景的遲鈍。新階級既是解放者，又是精英主義者。它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和評論性的論說文化是批判已有的支配形式的基礎，並且提供着一種逃離傳統的出路，但是它也孕育着新的支配的種子。

儘管新階級自身上有難解的死結，儘管新階級的內部（技術和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存在着裂隙，但是，在古爾德納看來，它仍然有可能成為新的**普遍階級***。新階級絕不像瓊斯基所說的是「權力的奴僕」，儘管不像加爾布雷思和貝爾所估計的那樣樂觀，但新階級畢竟變得更加強而有力，

更加具有獨立性。新階級固然不具有瓊斯基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但也不像派森思說的那樣戀舊，它雖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它畢竟具有一種新的集體取向。「新階級沒有抑制生產力的動機，也不希望只根據有利可圖的原則唯一發展生產力。新階級擁有現代生產力的未來所依賴的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同時，新階級的成員對持續的技術發展帶來的生態「副效應」和長期不經濟越來越敏感。而且，新階級是反對幾乎一切形式的審查制度的一個核心，世界處於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但是在這種運動階級過去以後，新階級也是所有社會階層中最具有國際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它是所有精英中最具有世界主義的。」（《知識分子》第 83 頁）因此，新階級是人類歷史到了今天可能打出的最好的一張王牌。

柏拉圖情結

這就是在西方世界代代相傳的柏拉圖情結。

知識分子相信，他們的文化代表着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最古老悠久的智慧和最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他們為人類的幸福和富裕做出了貢獻，他們理應獲得更多的報酬。知識分子新階級相信，「世界應該由那些擁有優越的才能、智慧和科學的人（也就是他們自己）來支配。柏拉圖情結，……是新階級的最深層的、希望付諸實現的幻想。」（第 65 頁）

*普遍階級(universalclass)，即代表着全人類利益和未來發展方向的階級。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就是普遍階級。

然而，這種幻想在柏拉圖那裏畢竟只能是理想國中的空談。柏拉圖像大多數富於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在《理想國》中把問題簡化到超出人類關係所能容許的範圍。「柏拉圖斷定明智的政府必然是由少數人治理的政府，這是對的，但人們不能單是把開明的專制奉為政治定論。斷言統治純粹是一個科學知識的問題，平民大眾可以將其托付給少數受過高度訓練的專家，這是忽略了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信念，即有些事情是必須由個人自己來決定的。」（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91—92 頁）因此，柏拉圖情結從一開始就是反民主的，忽視個人自由的。值得慶幸的是，柏拉圖在晚年走出了他精心勾畫的理想國，在其至今不大引人注意的《法律篇》中恢復了法律在希臘人的道德觀念中所應有的地位。他的後期思想經由亞里士多德發揚光大，影響深遠。西方社會歷經艱辛終於走上了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當代知識分子之柏拉圖情結的進步意義。

誠然，現代西方社會在法治保障個人（尤其是少數人）的權利和自由方面，確實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其政府以及統治者的權力也經過某種程序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遠不是理想主義的民主理論所設想的那樣民主，西方社會的機會遠非機會平等的宣傳者所說的那樣平等。其核心的問題就是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人們擁有財富的不平等。富有者經常可以利用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幹着與平等原則背道而馳的事情，而西方的競選制度更是只為富有者鋪平通向權力的道路。西方的民主制度以金錢來維

持，西方的平等是在金錢面前的平等。於是，西方一批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孜孜以求一種新的平等基礎，為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指點迷津。

古爾德納關於知識分子新階級的理論正是在這一點上是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他竭力為新階級鳴鑼開道，為的是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其中文化成為平等的基礎，同時也成為政府與統治者合法性的基礎。這是對基於金錢的平等的一種超越，是民主制度的新希望。民主絕不意味着事事都要由每一個人都參與，民主只意味着如果某人想參與某事，他就有可能參與。這種可能性愈大，就愈接近民主的理想狀態。可以肯定地說，古爾德納的新王牌以及丹尼爾·貝爾的「一種公正的能者統治」的理論並不是以踐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為前提的。現代的柏拉圖情結只是呼籲並渴望知識分子新階級擔負起更加沈重的歷史使命：重新認識自我，並在此基礎上求得新型的人際關係，重建維繫社會一統的精神道德支柱。

然而，中國的情況另有不同之處。作為一種大跨度的思考，古爾德納把中國的歷史選擇也納入他的理論框架。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避免新階級的技術知識分子興起的努力，「但是技術知識分子是具有理性的精英，既提高社會生產力又增進社會理解，現在中國正在清算『文化大革命』，並正在選擇新階級。」（第 53 頁）這種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界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古爾德納對中國現狀的粗略描述却也道出某些真實的東西。實際上，在中國大陸，專家統治論的趨勢亦愈發明顯。高度集中的權力已開始同技術知識結合在一起。可是，這在中國的歷史上無論如何不是一張王牌。毫無疑問，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法治